



朱德的政治觉悟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体现了坚强的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朱德就是其中一位。

□ 张东明

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担心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要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抗战时期，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每天非常忙碌。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搞了一次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这个小组大多是警卫班的党员，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理头工作，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义务劳动。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事，便找党小组长作检讨，并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内没有特殊党员，都是普通党员。每个党员都应当尽一个党员的义务，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我建议的，党组织也作了决定，我理应带头执行。这次义务劳动没参加，是说不过去的，欢迎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监督我严格执行党的决定。”不久，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再次作出了自我批评。警卫战士说：“这件事您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

了，往后就别再提了。大家说总司令50多岁了，日夜操劳，干活的事还是不参加的好。”朱德听后严肃地说：“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我年岁大一点，工作多一点，都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思想，交纳党费，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朱德严以律己、认真作自我批评的精神，感染着许多党员，教育了广大群众。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对这个决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愿执行。为搞好团结，朱德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但被张国焘一口拒绝。事实上，懋功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减员严重、装备给养困难，自恃兵强马壮，便打起了恃强夺权的如意算盘。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重新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会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朱德十分平静，若无其事

地翻看手中的书。张国焘逼着朱德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德拍案而起，桌子上的茶杯应声摔碎在地上：“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被编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战员对张国焘违反中央决定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些干部甚至酝酿私下拉部队去找中央。为避免因擅自行动导致更严重局面，朱德曾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在朱德的开导教育下，大家才隐忍下来，并在事实上成为牵制张国焘的重要力量。

正如徐向前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径，对于

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并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毛泽东曾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并挥毫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长征途中，由于粮食奇缺，又吃不上青菜，许多战士得了“雀蒙眼”（即夜盲症）。而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青菜。为此，朱德号召所有部队，只要有条件，都要种菜；没有条件的，也要多挖野菜吃。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炉霍，总部决定部队在此作短期休整。朱德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来一些菜籽，借来木犁，套上一头骡子，在驻地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种起了菜。半个月后，朱德种的菜已经冒芽了，齐刷刷、绿油油，鲜亮极了。不料就在这时总部下达命令，说过几天部队就要开拔去甘孜和二、六军团会师。这天傍晚，朱德招呼警卫员一起，再去给菜浇浇水，施些肥。警卫员嘴上答应着，行动上却磨磨蹭蹭的，一边找水桶，一边小声嘟囔：“菜长得再好，我们也吃不上了。”朱德一听，笑了，耐心地开导他说：“同志啊，我们吃不上，有啥子关系么？只要后续部队来了能吃上就行。

即使后续部队不经过这里，留给老乡们吃也好嘛！我们共产党人做事，就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咱们今天干革命，挨冻受饿，流血牺牲，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给千百万人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谋幸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我看你这个小脑瓜里还有多少有点子不好的东西哩！走吧，先跟我去浇水。至于道理嘛，晚上躺下了再慢慢想。”

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火不拨不旺，理不讲不通。警卫员是一个新党员，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豁然开朗。他提着水桶，高高兴兴地向菜地跑去。

要接班，不要接“官”。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朱德始终重视家庭教育。他曾经对孩子们说：“如果说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在长期探索如何教育子女、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要接班，不要接“官”。所谓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为人民服务的班，如果忘掉了人民，心里想的是当官，就会脱离群众，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要接好班就必须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实实在在在地干工作。

1953年女儿朱敏回国被分配到北

京师范大学工作，朱德立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女儿告诉爸爸，学校正在兴建，家属宿舍还不多。朱德说：“那就住集体宿舍，这样更能接近群众。住在我这里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只会使你们脱离群众，滋生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遵照父亲的教导，朱敏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了四年，才搬到分配给她的家属宿舍。

1962年，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的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经历，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要去追逐个人的名和利。”朱德的一个外孙中学毕业后，在他的鼓励下，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生产，被分配去养猪，由于力气不够，把猪食洒了一身，一生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后，马上回信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1974年，部队考虑到朱德已是88岁的老人了，几个外孙、孙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应该有人照顾，于是把在青岛当兵的小孙子朱全华调回到了北京。朱德知道后，当面对部队的同志说：“我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孝子贤孙。”在朱德的要求下，部队决定把朱全华调到南京海军某部工作。调令下来后，马上就要过年了，朱全华想陪爷爷奶奶过完年后再去报到，朱德听后严肃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增强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趣。”听了爷爷的话，朱全华在大年三十愉快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党史人物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四性”的重大意义

□ 李建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并对增强“四性”分别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四性”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出的“药方”，进一步指明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方向和途径方法，升华了我们党对党内政治生活规律的认识，为更好地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功能作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高度重视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1921年召开的党的一大，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彻底划清了我们党同其他政党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原则界限。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分别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等作出规定，确立了党的组织架构和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的基本行为规范，明确了纪律规矩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这都充分体现出我们党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明的纪律性。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首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着重强调党内批评要注意政治，否则就会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强调党内民主“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一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要求。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确立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时代特点、充满原则性和战斗性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二大党章及以后历次修订的党章，都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优良传统和基本规

范。这些优良传统和基本规范都贯穿、蕴含和体现了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要求，为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生机活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圆满完成中心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坚持党要管党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在传承和发扬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充分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坚持固本培元、激浊扬清、立规明矩、以上率下，下大气力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关键性、要害性问题，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明显净化，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健康发展新气象。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鲜活的实践经验，对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更好发挥其功能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增强“四性”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本质要求，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提出和不断丰富的。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严肃认真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强调“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第一次形成了关于“四性”的完整表述，凸显了增强“四性”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四个着力”的要求。其中，“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仅居于“四个着力”之首，而且是实现其他三个“着力”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准则》把增强“四性”的要求贯穿始终，体现在方方面面，标志着我们党对党内政治生活规律性的认识和运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总体状况是好的。同时，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是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强甚至丧失的表现，以致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烧得不够热、纯洁党风的“净化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落实“严”和“治”的要求，把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认真起来，解决好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离不开坚强的政治性、鲜明的时代性、坚定的原则性和高昂的战斗性；否则，党内政治生活就会受到损害，就会丧失活力、流于形式、失去作用，“严”和“治”就无从谈起，全面从严治党就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必须把增强“四性”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命题进一步抓好抓实，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增强政治性，就是要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好地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强时代性，就是要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原则性，就是要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好地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战斗性，就是要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在“四性”中，政治性是管总的，是第一位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又是有机关联、相辅相成的，必须一体理解把握、一体贯彻落实，使党内政治生活成为锤炼党性的“大熔炉”。

理论解读

建党初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创期”。建党之初，我们就十分注重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党内政治生活有了良好开端。党的一大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还制定了党的纲领，要求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纲领，严守党的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基本确立了党的组织架构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党费等分别作出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纪律规矩和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历程。192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在中央、省分别设立监察委员会，担负“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的职责等。这是对党的二大颁布党章的调整和完善，体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但很快，随着大革命失败，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也被迫陷入停滞。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徘徊期”。正是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毛泽东等人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有效途径。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判断，提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的建议。这一命题的提出，为党内开展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活指明了发展方向。此后，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党内政治生活并没有完全正常开展。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党内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化的转折点，会议不仅打破了党和红军内部博古、李德等人长期独断专行的局面，而且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重新恢复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领导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规整期”。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不断加强党自身的思路理论建设，先后确立了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逐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规范化，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还高度重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出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一时间，调查研究在边区政府蔚然成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全党上下扎根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巩固完善的基础上，我们党还分别就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的工作方式、议事规则、决策

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考察

□ 卢旭东

程序等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规范调整。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以党内最高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参与方式等作出了更为系统、完备的制度规定。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成为有效开展正常党内政治生活的坚实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期”。进入解放战争后，党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打仗本身，还涉及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等治理性问题，需要做到全党全军一盘棋，才能令行禁止，有效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为争取全面解放打下坚实基础。鉴于此，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政治生活。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号召大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通过开诚布公来解决自己；要求党委工作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党外人士也能做到礼贤下士，一视同仁。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开展，是我们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历史档案